

驼铃：在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上^{*}

——张广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访谈录

吴晓群 阿慧访谈整理

【编者按】张广智,1939年生,江苏海门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顾问、《史学理论研究》杂志顾问。他长期从事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曾荣获国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世界史学会终身学术成就奖等。本次访谈主要围绕张广智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走上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研究的道路、开展研究实践求索及其对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展开。

一、马克思主义史学滋养下的成长受教

吴晓群:很高兴有机会同张老师做面对面的访谈,一看到您拟定的这个访谈题目,我们就被吸引住了。首先,请您就“驼铃”这一形象的比喻略谈一二,然后再依照我们共同商定的访谈内容说开去,好吗?

张广智:好的。文题的“驼铃”出自我的一首小诗《驼铃》,刊登在《探索与争鸣》杂志2013年第7期封底上。阿慧,你朗读一下吧。

阿慧:《驼铃》(张广智作诗)

苍穹、夕阳、风沙
西出阳关
何处是我家
惟听驼铃声声
从远古走到当下

去纵览五洲风云
去描绘赤县彩霞
大漠无垠
前路漫漫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口述访谈录”(项目编号:LSYZD21013)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内容已经张广智审定。

追逐先行者的足印再出发

悠悠千载 纵横万里
行囊中始终只装着一份
中国梦的牵挂

张广智: 你声情并茂,把驼铃的具像显示出来了。驼铃之声的喻意深远,在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的文章中,我有一则题记,或可解之,其文如下:“面对茫茫大漠,人们多么渴望能听到先行者的驼铃;置身浩浩莽原,人们多么希望能发现探索者的足印。历史终于开了新天地,定格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的先行,似混沌初开,引领人们冲破旧世界的逼仄与桎梏;马克思的探索,世界史学史彰显在19世纪40年代,唯物史观的问世,似光风霁月,指引着人们拨开陈腐与偏见的阴霾,追随先行者的足印,去开辟史学的新时代。”^①

我想我们此次访谈,就从上述“驼铃”的深意展开,在我个人习史从教的五十余年中,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年轻走到年迈时,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不断前行。

阿慧: 这个旨意太好了。我们还是从您自身经历的源头说起,好吗?

张广智: 好的,从我的出身谈起。我出生在江苏海门乡下,农家子弟,父母的文化程度都很低,倒是祖父是当地乡间远近闻名的“知识分子”,他开办私塾,吸引四方学童前来求学。我的童年时逢乱世,战火驱散了那蒲公英飘拂过的童年。五六岁的时候,我就在祖父的“文云堂”书屋上学,成天背诵儒家经典,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论语》和《孟子》。更记忆犹新的是,祖父今天讲解的一段古文,明天要背出来。我记性不差,他给我的“作业”我很快地应付过去了,就带着小伙伴去玩。而对于背不出的学童,祖父要“惩罚”(打手心),他是真打,口中还说“谁叫你偷懒的,打!”经他“调研”后,察觉那些背不出的学生,是被我带头去玩了(抓麻雀或是捉蟋蟀),于是给我“层层加码”,我大多照样背出,但也受过“惩罚”。祖父一视同仁,“惩罚”后手掌要痛几天,不懂事的我背后向母亲告状,一边嚷着“坏爷爷,我不去上学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童年趣事还是蛮有劲的,那幼时背诵古书的童子功恰让我终身受益,至今仍难以忘怀。

阿慧: 弗洛伊德的心理史学十分关注个人传记中的“童年经历”。张老师这段“童年经历”,对您在日后选择历史研究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吧?

张广智: 是的,但我自1946年冬随母亲闯荡上海滩,这之后的受教都是在上海,小学和中学都接受了良好的正规教育。1959年,我考入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要说马克思主义受教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具体地说一下。

阿慧: 愿闻其详。

张广智: 先说一下进系后的观感。我于1959年秋进复旦大学就读的时候,历史学系师资十分强大,名师云集,足可与当年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相媲美,当时盛传的“历史学系四老”,他们皆生于19世纪末,按出生之日排序为:陈守实、周予同、耿淡如、周谷城,各自在中国土地关系史、中国经学史、西方史学史、世界文化史等领域业绩昭然;还有“两公”,即主研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谭其骧和主研中国思想史的蔡尚思,均蜚声史坛。还有其他的老师,不一一列举了。当

^① 张广智《曦园拾零:在史学与文学之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1页。

时,他们的年龄都不大,即便“四老”,也不过刚至花甲。这些老师都给我们本科生上课,真是获益匪浅。

阿慧:您师从耿淡如老师攻读西方史学史,能否具体介绍一下耿老师的情况?

张广智:世上一切皆见缘,信然。耿老师竟然与我是同乡。他于1917年就学于复旦大学文科,因家境贫寒,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维持学业。大二时,他与部分同学发起“戊午闻书社”,各同学捐大洋二元,购买书籍,这就是今日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前身。他任图书保管员,是当之无愧的复旦大学图书馆的创始人之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先贤们的艰苦创业,才铸就了今日我校图书馆的辉煌。1923年,他大学毕业,获学校“茂才异等”金牌。1929年他赴美留学,入哈佛研究院,1932年获硕士学位归国,被母校聘为政治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转入历史学系任教,直至逝世。他与复旦结下了一辈子的不解之缘,求学复旦又工作在复旦,扣除海外三年和辍学一年,前后竟有53年,这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系史上,还无人可以超越。对于耿老师作为中国第一代世界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主要奠基人,已讲得很多,可参见我写的相关文章。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他在1961年发表了传世名篇《什么是史学史?》,该文明确地指出: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新的史学史体系”;自马克思主义兴起,“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史学开始成为真正的科学”;我们研究史学史,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其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等。^①耿老师上述之言铮矣,连同他“谦虚做人,谦虚治学”的教诲,成了我毕生的格言。

阿慧: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深厚的历史传统和学术精神,从1925年建系以来已近百年,就您的马克思主义受教史而言,是与之休戚相关的。

张广智:你说的极是。前几年,为纪念建系95周年,系里编纂了一部文集《曦园星光 史苑流芳》,经集体讨论,由我执笔撰写“前言”,对建系以来的学术精神归纳为四点: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彰显独特的学术个性、以学问为生命的真精神。这一历史传统和学术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人,也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治学旨趣,一方面沟通个人成长史,另一方面则关联史学接受史。以我所在的59级为例,大学本科五年,历史学训练扎扎实实,使我们积累了有关中、外历史学的系统知识,还有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的广博知识;设有写作课,培养写作能力;设有逻辑课,培养言辞和思维能力;设有哲学课,传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值得一提的是,我系为我们一年级新生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马列主义基础课”,首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老师的讲解在我们这些刚跨进大学校门的學生面前,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懂得《宣言》是“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学说”(列宁语),^②《宣言》也是历史学系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必读教材。这门课程随后的内容中,我记得还有更高深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及列宁与斯大林的著作,如今想来,我由衷地赞叹系里为我们开设的这门课。

平心而论,《宣言》给我们班级同学印象太深了,它散发出来的唯物史观的光芒,一直引导着我们,其重要原因是任课老师袁缉辉出色的讲课水平,他深入浅出,条理分明,经纬有序,获得了学生们

① 耿淡如《什么是史学史》,《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

② 列宁《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页。

的一致好评。袁老师还兼任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多年后,我们方知袁老师是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的后人,作为三重顶级“豪门”的袁缉辉,却能在1949年后的疾风暴雨中平安无恙,这不由令人拍案称奇。从袁老师的经历上看,他已与旧世界告别,由此可以说,出身虽不能挑选,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

阿慧: 这位袁老师也太神奇了。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课程吗?

张广智: 有。如今我们59级老同学聚会时,回忆起大学老师的课堂教学,一致为两门近代史的任课老师点赞,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受教方面。一是教我们世界近代史课的程博洪老师,他上课时随身携带一个蓝封面的小本子,但他从来不看,只是讲到高兴时,用手拍拍这个小本本,意思是“我之所云,句句有据也”。印象尤其深的是,他讲近代欧洲的风云变幻结合同一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如讲19世纪的法国史,就随时联系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史实的铺垫愈丰硕,就会愈加深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当时他还邀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陈崇武老师,为我们导读《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另一个是教我们中国近代史的金冲及老师。

吴晓群: 说起金老师,情不自禁地让我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2015年11月22日这天,北京入冬初雪,晨起见窗外就下起了大雪,下午更甚,我们在上午参加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召开的学术会议后,您带领我们弟子七人,相约于当天下午去毛家湾金老师的办公室拜访他。您事先关照过我们,要给金老师赠书,待坐定后,您首先呈上自己编的刚出版的《复旦百年经典文库·耿淡如卷》中的《西方史学史散论》,接着我们也一一向金老师赠送自己的小书。金老师接过这些书,深情地对大家说“看到你们,看到你们的著作,太高兴了!史坛新秀茁壮成长,我们的历史学兴旺,后继有人啊!”金老师的话,语重心长,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广智: 我也是,金老师当年给我们59级学生上中国近代史课的情景同样记忆犹新啊!金老师是当代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翻阅文档,17年前时逢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他在给我的信中出自肺腑地写道“我们解放前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外来灌输,而是自己经过比较后选择的。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从总体上说明历史的发展,还没有其他学说胜过马克思主义的。”^①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他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对历史人物、事件,条分缕析,挥洒自如,且充满激情。比如,讲到林则徐禁烟时,他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犹如赵丹在电影《林则徐》中的念白;又如,讲邹容《革命军》时,他说“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②课后,我找来了邹容的《革命军》,读了又读,每读一次,都禁不住内心的激动,金老师讲课时的真情感染了我,也感染了我们班上的每一个人。金老师于1965年奉调到北京工作,直至2004年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这个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在岗业绩昭昭,退休后也退而不休,在史苑耕耘,伏案“爬格子”,写出了120万字四卷本的传世之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90岁高龄后,他还不辱使命,担当《复兴文献》的总主编,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雨露,滋润着我们的成长,激励着年轻一代史学家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旺

① 2005年10月10日,金冲及给张广智的来信,为张广智私人信函。

② 张广智整理《“中国近代史”课堂笔记》,为张广智私人笔记。

而奋发。

阿慧:在马克思主义受教史方面,还有给您印象深刻的老师吗?

张广智:有,那就是胡绳武老师。史学界说到金冲及,必定会想起胡绳武。胡老师比金老师大七岁,他们志同道合、并肩治史,同是复旦人,后又都在北京工作,他们合撰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卷本),150万字的皇皇大作,出版后被同行专家评论为“代表了我国现今对辛亥革命史研究最高水平的一部佳作”。^①我入读历史学系时,胡老师任系主任,分管教学工作,我猜想59级历史学系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想必是有胡老师这样的“高人”参与制订的吧。胡老师对我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在我读研究生时。1964年秋入学后,全国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研究生去奉贤参加了一期,历史学系师生也下去了,胡老师大概是在“夹缝”中来给我们上课的。为这次访谈,我翻箱倒柜找到读研时的学习笔记,里面记录了胡老师当时为我们开的专题讲座“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历史学”的课堂笔记,1965年5月6日开课,参考书为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再览笔记的内容,胡老师所讲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阐发了唯心史观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主要讲的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哲学观;第二是讲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于1844年8月在巴黎与恩格斯会面后,他们识见一致,结成了亲密的友谊。1845年秋至1846年5月,他们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他们是一种思想体系的共同创始人,恩格斯对创立和捍卫唯物史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1872年开始,恩格斯将这一新的历史观正式命名为“唯物史观”。“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找到了通向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胡老师如是说。课堂笔记到此戛然而止,若何?“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政治形势骤变,胡老师的课就中断了,耿老师在1965年12月开始为本科生讲授的“外国史学史”(当时我为该课程的助教)也停课了。胡老师理论素养深厚,尤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1962年,他借调到北京,参加教育部黎澍任主编的《史学概论》教材的编写工作,他负责编写第一部分“历史研究之成为科学”,给我们讲的内容就是出自这一部分(1984年,这一部分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为书名出版问世)。胡老师给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育,也缺少一个完整版,每念及此,心中未尝不能无憾。

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启发下的实践求索

阿慧:改革开放后,祖国山河巨变,历史学亦然。请您谈一下,20世纪80年代,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对促进西方史学研究的影响。

张广智:在我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受教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聆听老师的教诲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自身在实践中学习,在求索中进步。你们大多没有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春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历史科学的春天”,为西方史学的发展营造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时代氛围和客观环境,最明显的一点是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被打破了。1976年底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几年里,在史学界就是你说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大

^① 张广智整理《〈辛亥革命史稿〉读书笔记》,为张广智私人笔记。

体是以“反思史学”的形式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温经典马克思主义,挣脱“左”的锁链,打破现代迷信,思想解放,这无疑对重评西方史学和引进西方史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时,“重评”与“译介”同向而行。这时的“译介”之势,可以被称为自20世纪30年代第一次引进西方史学高潮后的第二次高潮,像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竟成为史学研究人士的案头书,这不多讲了。我这里说的是“重评”。在20世纪80年代,它似乎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激流,涉及过去被批判过的西方著名史学家和流派,如对兰克史学及兰克学派、汤因比与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以鲁滨逊为代表的美国“新史学”派,等等。

阿慧: 请张老师举一个例子,恭听其详。

张广智: 好的,我想以自己在1989年《史学理论》(《史学理论研究》前身)刊登的《托马斯·卡莱尔的史学思想再评价》为例说明。我自认为这是一篇较为典型的“重评”之作,但也不过是重评浪潮中的一朵浪花而已。托马斯·卡莱尔长期蒙受“法西斯主义思想家”的恶名,学界对他的“英雄崇拜论”予以贬抑,拙文力图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从他的生平剖析他的名作《英雄与英雄崇拜》,认为卡莱尔的“英雄崇拜论”有一段历史的发展过程,不能一概而论,“英雄崇拜论”作为一种历史的观念,在历史上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不能一笔抹杀;由此说开去,在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像托马斯·卡莱尔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当以唯物史观之光映照,方能做到拂去岁月带来的风尘,洗刷后人泼上的污浊,还其人其论以本来的面目。

吴晓群: 您在课堂上经常给我们讲,研究西方史学,研究一位史家,不只是对历史学(或历史学派)著作和思想的研究,还要研究他们向外界传播,为输入国读者所接受的过程。

张广智: 从接受史学的角度而言,一位史家,一部名著,一种史学流派,一股史学思潮,何时传入他国,通过何种途径传播,输出后在输入国又引起了怎样的回响,都应当引起史学史家的关注,都应当从输入国的接受环境与读者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s)中找到解释,如前面提到的对托马斯·卡莱尔史学思想的研究。需要说明的是,我于20世纪80年代写就的这篇文章,就缺少卡莱尔东传中国的“影响研究”,可谓美中不足也。

比较理想的中外史学互通的“影响研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还是“欠火候”的。我在当时所做的工作,也不过是“域外东传”,比如1996年我在《史学理论研究》第一、第二期上连载的《二十世纪前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十年前辑集“域外东传”的文稿,成书为《克丽奥的东方形象: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也不过是“域外史学在中国”篇,至于“中国史学在域外”,仍旧尚需时日。

阿慧: 在西方史学东传史的梳理研究中,您明显地突出了李大钊,说他于1920年编纂的《史学思想史》,是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之发端,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这里很有必要请您对李大钊这方面的学术贡献略作评述。

张广智: 好的,实在很有必要。2021年,在百年党史教育时,辅之以十分精彩好看的红色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等,李大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的形象,传遍神州大地,对此你们都有深刻的印象吧,这里不赘。我还是说本行,李大钊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他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眼力,传入西方史学,尤其是西方近代史学,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在北京大学等校相继开设了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随之致力于近代西方史学的研究,这是为他

理解与传播唯物史观而寻求学术渊源的理论基础。他为此写出了一系列文章,辑为《史学思想史》讲义。通读华章,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他对近代西方史学的述评,侧重于历史观。从16世纪的法国史学家鲍丹(今译让·波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意大利历史哲学家韦柯(今译维柯)、法国历史哲学家孔道西(今译孔多塞)至19世纪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桑西门(今译圣西门)等,映照出西方史学从神学史观向人本史观的转变。第二,他对西方史学遗产采取了求真精神,如对上述诸家的史学思想,皆采取中肯的评述,而且是介绍先于评论,评论亦非恶语相向,而是科学意义上的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第三,他对西方史学的认知,是超越同时代人的。以《史学思想史》为例,该书收入的七篇文章,涉及近三十位西方历史学家,介绍了近代西方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他对这些史家及其史学思想的评述,为其阐释马克思主义有深远的意义。第四,需要指出的是,李大钊首先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西方史学的研究决不是书斋式的,而是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厦奠基的全部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输入西方史学,其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需要。

阿慧:您于2005年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问世后在学界激起很大的反响。请您以这篇文章为例,谈一下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于史学研究带来的重大突破。

张广智:言重了,就个人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永远在路上。不过,《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中的几个问题》的写作,另有一些背景。上面我们已经说到了程博洪老师在讲授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连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多年后总是想要写写这段历史和学习马克思的这部“天才的著作”,此时又恰逢良机。2005年是我校百年诞辰,《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早就计划出一个纪念专刊,早早地就向我约稿,说要提交一篇“重磅”文章。为此,我确是费尽心力,对马克思的经典作了“剖析发丝”(hair-splitting)的研究与思考。

阿慧:愿闻其详。

张广智:比如,说及《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叙事,马克思无愧为“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他叙事的有条不紊、叙论紧密结合、叙事中的历史比较、叙事中的修辞艺术等,赞曰:厚实而不失畅达、庄重而不失幽默、犀利而不失清逸、丰润而不失大气。倘把马克思的史学遗产仅仅归纳为唯物史观,是不够完整的,还应当研究马克思著作,尤其是历史著作,需要从历史学自身,即从狭义的史学理论来考量,比如他那精湛的历史编纂能力,尤其是叙事才华,进言之,马克思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导师,也是当时卓越的历史学家,可与同时代的兰克、蒙森、米涅等西方一流史家相媲美。

阿慧:看来,作为历史学系毕业的学生,应当熟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还要熟读他们的历史著作。

张广智:是的。经典常读常新,重温经典,是我们学术工作者一辈子的事;熟读他们的历史著作,更是我们史学工作者必备的素养。回到拙文,上面只谈了“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接着就传承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做了纵向的回顾与总结,从弗兰茨·梅林、普列汉诺夫到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衰,再到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曲折坎坷,最后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特征。可以这样说,21世纪伊始,像拙文这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作较为全面论述的文章似乎还

不多见,于《复旦学报》的校庆百年纪念专刊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于我个人在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上,又踏实地迈开了一步。

阿慧:在当下高校历史学系的课程设置中,总是把“中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并列,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内容则通常被添加到上述两门课程之中,对此您觉得如何?

张广智:就高校历史学系人才培养而言,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史单列出来,有条件的学校首先开设“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纲要”之类的课程,是必须的,也是可望的。就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言,更是必须的,且是经努力可以实现的。就我个人经历而言,在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道路上也留下了足迹,以下我将分层次讲一下。

阿慧:愿闻其详。

张广智: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于19世纪40年代,它当与马克思主义同步诞生。如果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至1846年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唯物史观,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初现算起,迄今已有178年了。在漫长的世界史学史上,这178年却是短暂的一瞬间,但从它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留下了亮丽的、璀璨的华章。我曾经在课堂教学或学术会议上,不止一次地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开创至今的“谱系”,你们说说看。

吴晓群: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谱系”,据我的记忆,张老师似乎是这样讲的:您当时板书,最先写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个大字,接着逐一写了几个分支: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欧洲的最初传播”,说的是德国的弗兰茨·梅林和卡尔·考茨基、法国的保尔·拉法格、意大利的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俄国的格·瓦·普利汉诺夫等人的贡献;其次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讲了它的兴衰及教训;再次是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最后说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诞生和曲折发展。

张广智: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谱系”,你记性甚好,复述得不错。对此我还需要做点补白。所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指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以唯物史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欧洲的最初传播,首先得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史学实践和理论研究,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可贵“品格”,当然也得益于上文中提到的弗兰茨·梅林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工作业绩,马克思、恩格斯之于梅林等人的传承,我以为是一脉相传的;关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遗产传承史上,可作为一个个案,总结其经验教训,下面另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于20世纪20年代发端,从边缘到主流的曲折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当下史学各种理论、范式多元并存的新局面,在我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只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求索,将会有璀璨的前景。

阿慧:您的这个“补白”,对于我们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下面,请您谈谈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沉浮。

张广智:好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于我们这一代的史学工作者有着直接的影响,我们的前辈耿淡如老师,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学习苏联史学,还特地学了俄语,直接从当时视为先进的苏联史学翻译出版俄文历史著作,供教学和科研之用。大学读书时,苏联版的《世界通史》《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如今,苏联这个国家虽已解体,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份史学遗产,并不随之消失。在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上,认真回顾与总结苏联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是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

对此,我做过认真的思考,写了《珠辉散去归平淡——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这类的长篇文章(约五万字),也有个案研究的《苏版〈世界通史〉的中国回音》等学术论文,都可找来一览。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历经七十多年,可概括为:初创的艰辛、坎坷中前行、曲折中进展。在那里,老是冷暖失常,阴晴不定,更兼几番暴风骤雨,催落花枝凋零,遑论于风雨憔悴中煮字烹文,备受折腾的苏联历史学家,总是在苦苦地寻求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自身价值与自身地位,不论斯大林时代的政治高压政策下,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生的那场虚幻的“历史热”中,它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的。这里提供以下几点供参考: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非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有道是珠辉散去归平淡,当我们拨去了附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之后,还其原貌,我们发觉,在世界史学园地中,它与其他派别一样,互有轩轻,各有千秋。在评价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植入中国问题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要正确看待它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任意夸大或一笔抹煞都是不可取的。

阿慧:十多年前,您携张门弟子陈新、梁民慷、周兵和王立端,合力攻关,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11年易名为《史学之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出版,请您介绍一下这本书。

张广智:这本书共十章,是首次从整体上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梳理和探索,我们所做的工作如“学步邯郸”,是一次真正意义的“初探”,或可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为此,我摘录一位该成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意见:“本成果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系统、最深入的关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第一部作品。全书持论谨严、内容宏富、资料翔实、结构合理,反映了作者们的西方史学史与史学理论的专业水平,也显示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素养。本成果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它的问世,对推动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影响。”

因反馈给项目主持人的评论是匿名的,故我至今不知道他是何方人士,借此录之,以表谢忱。本书出版已12年,我衷心希望后来者能写出新的超出我们的大作,但迄今为止还没有,至为盼焉!

三、马克思主义史学引领下的心得期望

阿慧:“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八个闪亮的字是您始终秉持的治西方史学史的理念,请结合您的系列之作《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史学:文化中的文化》《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通史》《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等来谈一谈高见,为后来者学习与研究西方史学史指点迷津。

张广智:“指点迷津”不敢当,只是借此谈一点多年来治西方史学史的心得体会,与你们分享。众所周知,近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总体而言,这门学科还是很薄弱的,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述评层面,独创性的研究还不多。然而,只要我们努力,可望在这块被视为西方学者的“世袭领地”上收获中国学者深耕的果实。我个人习史从教五十余年来,逐渐形成了

治西方史学史的基本理念“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就昭示中国学人研究西方史学的主体意识,即“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我在2012年第10期《史学月刊》上刊发的《再出发:中国西方史学史学科的传承与展望》一文,对这一理念有较为明晰的自觉意识。现择其要旨,略谈一下。

正确对待西方史学。中国学人应对扑面而来的西方史学,既应持有主体性的自觉意识,同时也应有容纳天下的世界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待西方史学,或盲目信从,或一概排斥,都应为我们所不取。我们要增强文化自信,拥有一种真正切实的自信,既要有摆脱昔日为“洋人”做“小工”的下手角色的志气,也要有汲纳和借鉴域外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的大气。从汲纳中丰润,从借鉴中创新,在“洋为中用”上下功夫。

用中国学者的眼光,梳理与探索西方史学;以我们的史学实践,尝试创造自己的话语体系。比如,我们多卷本的《西方史学通史》问世后,有评论者认为,中国学者自此在西方史学史这一学科中“有了自己的话语权”,这当然是学术界对我们工作的褒奖,鼓励我们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行。我们尽力了,在写作《西方史学通史》时,力图以“五次转折说”阐述悠长的西方史学发展进程;力图从解读文本着手,让各卷作者以各自独特的视角述论,疏离“西方中心论”;力图从各个时段的历史背景,尤其是文化背景,考察西方史学的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当代史学。

拿出彰显中国史学特色的重大学术成果,力争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比如花了十多年的辛劳终成硕果的《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史》,被中国历史研究院评为“2020—2021年度中国历史学五部优秀著作”之首。评审专家于沛认为,本书“为推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深入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本书“开拓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本书“不仅有重要学术价值,更有重要现实意义”;本书“必将为构建当代中国历史学‘三大体系’提供历史智慧和理论启迪”,作出开创性的贡献。专家的赞词,是我们坚持和今后继续努力的目标。

沿着“西方史学,中国眼光”这一方向,我们既要有敢为人先、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也要恪守耿老老师的“谦虚做人,谦虚治学”的虚怀若谷,为构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厦添砖加瓦。

阿慧:张老师的这几点心体会,讲得太好了。在中国史学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过程中,我们从事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的研究,“西方史学,中国眼光”应当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唯其如此,才能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鉴于此,我们作为年轻一代的史学接班人,当奋力前行,多作贡献。我们的访谈也快接近尾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理解,请您作一个概括性的结语,好吗?

张广智: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没有穷尽的,因为时代的不断变化,社会的不断进步,马克思主义也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亦然,我断断续续在教学与文章中,有一些零星的浅识,《西方史学通史·导论卷》有一个小结,现把它集中起来,谈一些肤浅的看法,恭请识者指正。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精辟揭示的“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

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自此,由于马克思的先行,终于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

纵观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它的发展史,从史学史学科的角度而言,我认为具有以下三个特性。

一是唯物史观的历时性。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同其事物一样,也是历史的产物。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诞生于19世纪中叶,既是当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尤其是科学技术在19世纪的全面进步的时代反映;又是其时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迫切需要,因而唯物史观的出现应是水到渠成,应运而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马克思(当然还有恩格斯)的天才,并批判继承了一切优秀的西方史学遗产的结果。唯物史观既然是历史的,我们也应以唯物史观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

二是唯物史观的发展性。唯物史观是19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既然在历史中形成,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因而我们不应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语只言,或墨守他们的个别结论。在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东传史上,无论正本清源也好,还是回到原典,都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命力之所在。

三是唯物史观的恒定性。我们常说唯物史观是长青的,这就是说它的恒定性。这种恒定性,不是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和片语只言,而是指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或基本原理),唯物史观的个别论点可被完善与修正,但它的核心理念却是万古长青的。对此,我们应笃信不疑。这个核心理念是什么?学界见仁见智,自可进一步探讨。我以为,简言之,就是前引恩格斯的这段经典论述,我们在革命和建设工作中,应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而不动摇,唯其如此,才能让唯物史观的火种燃遍东方,照亮这片古老的大地,永葆青春之活力。

总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光芒,指引着我们史学工作者的方向。我们研究史学理论与西方史学史,应有一种正确的历史观,这“正确的历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只有这样,才能秉持“西方史学,中国眼光”,掌握西方史学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洋为中用”,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助力,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阿慧:最后,我们想请您谈谈对我们年轻一代史学工作者的期望,尤其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于助力中国史学的要求和期望。

张广智:国家的希望在青年,中国史学的未来也在青年。为此,谨以下述微言,聊作寄语,献给我国青年史学工作者。

其一,希望为彰显中国史学的个性特点而努力。众所周知,我国拥有丰赡的史学遗产,具有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对于先贤的遗产与传统,需要有年轻人的锐气,发扬批判精神,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在传承中超越。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希望你们在彰显中国史学特色,快步走向世界的进程中竭尽心力,走在前列,在国际史学界发出中国史学的最新声音,以消解西方学界对中国史学的种种偏见,还一个真实的中国史学形象。

其二,希望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当今,“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国际形势风云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3页。

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下,跨文化对话已成为可能,于是不同国家之间,东西方之间,跨文化对话就显得十分必要,史学无疑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途径。具有远见卓识的历史学家,倘都以对方为“他者”以反观自己,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或民族的史学传统,并尽可能汲取他国的经验与智慧,来克服自身的问题,那就可以不断开拓史学的新天地。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在“走出去”和“请进来”的中外史学交流与互动中,起到“马前卒”和“急先锋”的作用,这是时代赋予你们的使命,也是实现中国史学走向世界的历史责任,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担当。

其三,希望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助力。这是一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实现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然而反观现状,现实与未来的目标,总是不尽如人意。为此,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应当率先拿出自己的卓越成果,在中国史坛上冒尖,以此登上国际史坛。事实证明,只有拿出自己有分量的能体现中国史学个性特色的成果,并能不失时机地与域外史学进行沟通与交流,如此方能在世界史学上占有一席之地。倘若这样,我们就能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取得中国史学应有的位置,并为世界史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任重而道远。肩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任,实现中国史学梦的召唤,给未来的包括西方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历史学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和希望。汹涌澎湃的新思潮,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日新月异的新方法,吸引与激励着我们奋发有为,攻坚克难,中国史学梦的理想更瞩目于年轻一代。时代正走在新的跑道上,且看中国史学新时代的曙光已升起在历史的地平线上,让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奋斗吧。

阿慧:谢谢您在百忙中接受我们多次的访谈。您在访谈中对后辈的教诲,特别是最后的期盼,我们记在心里。

张广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①先贤屈原的名句正应验了我的学术旨趣与执着追求,学习与求索马克思主义史学,永远在路上。因此,我的寄语,既献给你们,也留给自己,愿与大家共勉之,共为之!

(访谈项目主持、方案设计、现场提问补充、录音整理稿最终审定者吴晓群,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现场访谈主要提问、采访录音文字整理者阿慧,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林家骊译注《楚辞》,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9页。